

airiti

東亞觀念史集刊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EAST ASIA

第 四 期

劉鶚與其小說《老殘遊記》

普 實 克 著  
羅 仕 龍 譯

**Liu E and His Novel: *Lao can you ji***

Jaroslav Průšek  
Translated by Lo Shih-lung

東亞觀念史集刊編審委員會

中華民國102年6月

JUNE, 2013

## 劉鶚與其小說《老殘遊記》\*

普實克 (Jaroslav Průšek)\*\* 著

羅仕龍\*\*\* 譯

一、

1933年，筆者在北平初讀《老殘遊記》。<sup>1</sup> 當時幸賴張君勸教授（張教授聲名遠播德國）夫人慷慨借閱胡適教授《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讓筆者得以間接認識《老殘遊記》一書。或許可以這麼說，胡適書中的分析說明，讓人發現了中國小說的存在，也為筆者在中國文學的叢林裡打開一條通路。

研究中國文學史的歐洲學者對《老殘遊記》隻字不提。作者劉鶚的名字，不見於任何歐洲百科全書或傳記辭典。迄今為止，其小說也未曾翻譯為任何一種歐洲語言。<sup>2</sup>

1940年春，年輕的德國漢學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提供

---

\* Jaroslav Průšek, "Liu O et son roman," *Archiv Orientální* 15 (1946.6): 352-385. 本文係捷克譯本《老殘遊記》序。

\*\* 作者係二十世紀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漢學家，深諳中國歷史與文學。

\*\*\* 譯者係法國巴黎新索邦大學博士，現任巴黎第七大學中文系講師。

<sup>1</sup> [普實克原注] 除了少部分改動以外，本文中的專有名詞借用威托瑪拼音之英文譯名。〔譯者按〕普實克原作僅有兩個腳注，其餘註釋皆以括弧方式直接插入正文。

<sup>2</sup> 譯者按：《老殘遊記》首部英文全譯本於1939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譯者為林疑今、葛德順（參見郭延禮〈《老殘遊記》在國外〉一文）。普實克所指係在歐洲出版的歐語譯本。

筆者許多關於中國文學史的翻譯與著述。這些翻譯與著述的主題各異，從1935年起陸續發表於漢堡出版的《東亞評論》（*Ostasiatische Rundschau*）期刊。在1940年出版的期數中，筆者發現了阿英《晚清小說史》首兩章的譯文（普實克按：以下引述時僅用阿英之名，不另提譯者姓名），而《晚》書中正好有一段詳述了劉鶚的作品。

阿英強調劉鶚的敘事技巧，並引述明湖居聽書，黑妞、白妞出場的片段作為佐證。此外，阿英也談到了作者的理想。根據阿英的說法，小說的女主角身上，往往寄託著作者的理想之身。<sup>3</sup>

阿英這篇文章，是唯一一篇以歐語刊載的《老殘遊記》研究。然而，中國文學史家倒是常在著作裡言及劉鶚與其作品。1925年，胡適已撰寫了深入的研究專文，收錄於《胡適文存三集·卷六》（普實克按：頁788-823。下文引述時，僅標示胡適之名，不另詳注來源）。下文將詳論之。

1933年時，筆者尚無法掌握《老殘遊記》的意旨。及至經歷一番不同於歐洲經驗的文化衝突後，<sup>4</sup> 筆者才掌握到作者想說，以及書中人物所代表之事。這番領悟的過程，與其說是特意為之，倒不如說是直覺的引導。事實上，遲至1940年春，筆者才開始勉力研究《論語》。在此之後，筆者也才真正理解此番學思的來龍去脈。

過去筆者對儒家思想並未懷抱滿腔熱情。但當筆者重讀《論語》時，眼前漸漸樹立起一位有生命的人物，而不再只是一堆冗長的教條與道德教訓。這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就是劉鶚筆下的老殘。

劉鶚對中國文學的貢獻（普實克按：劉鶚不是中國文學史上唯一的例子，筆者將於下文以其它例證詳述之），就像杜斯妥也夫斯基

<sup>3</sup> 譯者按：阿英指出，劉鶚的「理想之身」，「託付在書中的異人身上，那就是初集裡的瓊姑，二集裡的逸雲」；「由於各個條件在舊時代人物理想上的適合性，和作者自己心理上的原因，這個創造的理想人物，在性別上，必然是落在女的一面」。

<sup>4</sup> 譯者按：普實克於1932至1934年訪華期間常走訪民間，由此對庶民生活與話本小說產生極大興趣。

對基督教的貢獻一樣。劉鶚將儒家志士的傳統理想賦與清楚可辨的外觀，並且將其置放於現實生活中。一切自然而然發生，毫無悲劇衝突。這就是儒家學說的弱點，或者說是強項也不一定。總之，一部作品既然提出如許問題，就不會是一部等閒之作。劉鶚的著作文筆極佳，而其內涵遠較文字表面更為深長。精神與智識的價值，遠甚於甜蜜的糖；我們需要前者，因為它足以發聾振聵。我之所以選擇《老殘遊記》，將其編入捷克語的東方文學選輯（布拉格 Melantrich 出版），其原因正基於此。

《老殘遊記》是中國古代文明在衰落前的最後一篇偉大贊歌。不到十三年後，中國出版的書籍將使用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語言。<sup>5</sup> 這種語言貼近我們身處的時代，也因此較不引人入勝。劉鶚的作品在這段歷史上承先啟後。中國文學即將重被世人發現，因為我們的世界需要它。

## 二、

小說《老殘遊記》於何時首次出版？書中序言標注係1906年。<sup>6</sup> 根據阿英的研究，《老殘遊記》首刊於上海《繡像小說》。該刊由

---

<sup>5</sup> 譯者按：普實克指的是白話文。

<sup>6</sup> [普實克原註] 由於筆者現有的《老殘遊記》版本已將〈序〉刪除，故無法翻譯之。此外，筆者藏有一本書況不佳書店刊印版。其實書店刊印的中文新小說常有這個問題。筆者所持有的這個版本，是上海新文化書店於1933年出版。筆者旅居中國期間，並未購得胡適先生引述的亞東圖書館（後被併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版本。此一版本為最佳版本。本文所引用的胡適研究專文，正是亞東版的序。為翻譯《老殘遊記》書，筆者多次走訪海外圖書館卻徒勞無功，遍尋不得此一最佳版本。因此，筆者往往必須夜以繼日，校訂所使用版本中蜂擁而來的訛誤。常常一個錯字，因為讀音相同而被誤植，造成了意義的混淆。筆者翻譯第12回「黃河結冰記」時，耗費相當多的時間解讀作者的原意。例如，某版本中可見「插瓶」一詞，但此詞實無意義。作者原意是「插屏」（屏與瓶同音），亦即中國人常置於桌上的一種擺飾。此外，書中人物的名字時有歧異，筆者悉數保留之。

知名作家李伯元主編，惟李於 1906 年逝世。

筆者在下文將翻譯並引用劉鶚之孫劉鐵孫所撰之劉鶚傳略。<sup>7</sup>此文指出，《老殘遊記》正集同續集六回，最初是在《天津日日新聞》按日連載。根據此一初版，日後又於《繡像小說》重印。

劉鶚嫡孫的說法有誤，<sup>8</sup>因此難以確認《老殘遊記》的出版日期。不過，劉鶚應該不可能早於 1902 年完成《老殘遊記》，而本書也不會在 1902 年前出版。

筆者將 20 回《老殘遊記》完整譯出。除此之外，劉鶚還曾發表過六回續編，<sup>9</sup>當中描述了老殘登泰山，會見道姑逸雲之事。此為小說全書最精彩之處，惟限於本書篇幅，期待日後能另行介紹給捷克讀者。

《老殘遊記》於上述報刊登出後，續編漸為讀者所遺忘，直到 1934 年才再次刊載於《人間世》半月刊。之後，上海良友圖書公司集結出版此書，由聲名遠播歐洲的作家林語堂擔任此版本主編。

總之，《老殘遊記》一書寫作與發表的時間，應介於 1902 至 1905 年之間。

### 三、

然而，這正是中國衰敗至谷底的時期。在此之前的整整七十個年頭裡，中國吃的敗仗一次也沒少過。1839 年到 1842 年：鴉片戰

<sup>7</sup> 譯者按：普實克所引之傳略，係出自劉鶚之孫劉厚源（字鐵孫）所撰之〈良友版《老殘遊記二集》跋二〉。詳見下文。普實克在下文中另引劉鶚之侄劉大鈞之文。因劉鐵孫與劉大鈞發音接近，故普文將前者稱為“Liu Chin”（省卻「鐵」字），後者稱為“Liu Ta-chin”。

<sup>8</sup> 譯者按：《老殘遊記》初發表於《繡像小說》，至十三回因故中止，後又續載於《天津日日新聞》，並非如劉鐵孫所言，「最初是在《天津日日新聞報》上按日發表的」。

<sup>9</sup> 譯者按：1935 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老殘遊記》的續編，題名為《老殘遊記二集》，共 6 回。事實上，「續編」最初在報刊連載時共有 9 回。1962 年出版的魏紹昌編《老殘遊記資料》，刊載「續編」的 7 至 9 回。普實克寫作此文時，應尚無機會讀到「續編」的後 3 回。

爭。1856年到1860年：與英國、法國、俄羅斯交戰。1884年到1885年：因印度支那問題而引起的中法戰爭。1894年到1895年：因朝鮮問題而引起的中日甲午戰爭。及至1900年庚子拳亂，導致八國聯軍與清廷兵戎相見。每一次戰爭結束後，換來的是恥辱性的和平。每一次都有港口割讓給外國，每一次都讓外國人建立新的租界（事實上也就是殖民地），每一次列強之間都重新劃定各自的勢力範圍。不僅如此，中國還掉進了外國銀行家所設立的圈套。他們鼓吹中國政府向其借款，同時又要求中國政府允許其修築鐵路、開採礦藏等等。中國的歲收遂淪於列強掌控。

人民群眾的不滿與日俱增。人們相信，1644年入關的清王朝已被天命所棄，氣數將盡。早自十九世紀伊始，帝國各地叛亂鶻起，其中氣燄最盛者莫過於太平天國。在其為亂的十四年間，中國最富庶的長江中下游平原被蹂躪殆盡。

各省都出現了程度不一的叛亂。寄望得到救贖的民眾心理，讓解各種不同宗教色彩的團體順勢而起。有些團體意欲推翻清政府，而義和團之流則是以打倒洋人為號召。士子階級在這個時代裡，惶惶不知所措。

劉鶚認為，當時士人只知抱殘守缺，服膺於固有道德教化與美學思想所營造出的常規正道，而幾乎不了解他們所處的時代，已將他們捲入一場空前的生存搏鬥，其對手來自一個截然不同的文明。面對這個對手，只有屈服，或者敗亡。中國士子不明白西方文明奠基於科學技術。對中國士子而言，科技不過只是「奇巧淫技」。用孔子的觀點來說，這些雕蟲小技乃是「小人」所追求。真正的「君子」，當寄情於文章學問，恪遵先聖先賢之道以經世濟民。

不管是文人士子，或者是政壇的守舊陣營，都只想蒙昧世人。面對時局暴雨將至，他們選擇緩兵之計。這個方法過去大多時候還算有效：先讓洋人消消氣，然後伺機而動從長計議，找出對策將其一舉掃蕩出境。於是，慈禧太后身邊的親信與狂熱的貧民一樣，試圖通過各

種法力與符咒，找到抵擋洋槍洋炮的秘方。由於這些守舊派的輕率大意，終於釀成了義和團之亂。

雖然當時不乏優秀的知識分子深知改革的必要性，但是他們也找不出新的對策。就像他們的父祖輩一樣，他們總以為，只要賢君勵精圖治，一道聖旨下達，自可改觀人民生活。而事實上，這也正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根本，所謂「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

這正是錯誤觀念的根源。知識分子們見識到歐洲之所以強大，並非端賴船堅炮利與器械精良，而是得力於體制。於是溫和的改革派希望將中國改變為君主立憲制，其改革計畫甚至在1898年贏得光緒皇帝的支持。然而，這段期間推出的改革措施有欠周詳，史稱「百日維新」；慈禧太后（1862年至1908年垂簾聽政）身邊的保守陣營，最終使其功敗垂成。多名改革派人士慘遭殺頭問斬，倖存者潛逃日本，而光緒本人則自此被幽禁於瀛台。此一事件對激進改革派的刺激甚大。以孫逸仙為首的政黨認為，只有通過最激進的手段，也就是建立共和，才能一舉解決問題，為既有體制帶來決定性的轉變。他們簡單套用西方公式，認為國家強盛與否取決於制度，而只要國家的體制是「進步」的，自然可以解決國家前途問題。革命黨人搏得了年輕一輩，特別是年輕官員的好感。1911年，他們成功發起革命，推翻滿清帝國，但他們的革命徒讓中國的情勢更加險峻。

#### 四、

劉鶚不屬於上述任何一個陣營。他不打算走一條別人鋪好的道路。他一方面想學西方人修築鐵路、開發礦藏，另一方面又想保存中國古典文明。他就像日本明治時期（1868-1912）的維新派人士一樣，改革的胸襟領先同時代。

劉鶚的子侄輩及其身邊友人試圖為其撰述生平，不容青史成灰。

雖然隻字片語難以勾勒劉鶚全貌於萬一，但筆者傾向盡可能地引述這些「斷簡殘編」。原因無他。主要是其中一位作者羅振玉係清末民初知名文人，其文筆與切入觀點帶有典型中國傳記色彩。引述這些文獻還有一個好處，就像是觀看原汁原味的畫作，到底要強過後人添枝加葉的仿作。

筆者首先引述劉鶚後人所撰述的文章。文章以編年紀事的方式寫成，收錄在上述林語堂編《老殘遊記》書後。<sup>10</sup>下文將另外引述羅振玉之文。該文轉引自胡適的研究，<sup>11</sup>收錄於前揭書，頁789-793（普實克按：下文引述時如有筆者加注，將另行說明之）。

我家原籍安徽廬州，自我們的廿五世祖劉光世隨宋高宗南渡，鎮守江蘇鎮江府，當時就以鎮江府的丹徒縣（又稱南徐州）為家。先曾祖諱成忠，字子恕，1852年進士，<sup>12</sup>授翰林院編修，後來升京畿道監察御史，河南各府道等職，在河南辦黃河，平捻匪多年。

著有詩集與治理黃河之論述。<sup>13</sup>先祖生於1857年九月初一日。生的地方一照先曾祖做官的年代推算—大約不是北京，就是河南。

先祖行二，有長兄一人，諱夢熊，<sup>14</sup>姊三人。

1900年大亂以後，聯軍攻進北京，<sup>15</sup>饑民甚多。先祖從上海到

<sup>10</sup> 譯者按：以下引文節選自劉鐵孫〈良友版《老殘遊記二集》跋二〉一文。普實克之分段與原作不同。此處的分段係根據普實克譯文。

<sup>11</sup> 譯者按：普實克指的是收錄於《胡適文存三集》卷6的亞東版《老殘遊記》序言。詳下文。

<sup>12</sup> 譯者按：劉鐵孫原文同時標註清代紀元與公元紀元。普實克譯文僅保留公元紀年。下文同。

<sup>13</sup> 譯者按：劉鐵孫原文為「著有《因齋詩存》、《河防芻議》兩書」。普實克未將書名完整譯出。

<sup>14</sup> 譯者按：此處劉鐵孫原文為「諱夢熊，字味青」。普實克將「字味青」刪去。

<sup>15</sup> 譯者按：劉鐵孫原文為「聯軍攻進北京，大亂以後，饑民甚多」。參照普實克的譯文，顯然普實克所指的「大亂」是義和拳亂，而非劉鐵孫原文所指的八國聯軍之亂。



北京放賑，當時俄國軍隊占據太倉，外國人不吃米，先祖設法從俄人手中買來，平價賣給人民吃，救活不少人。

但是到1908年，清朝把舊事重提，說先祖盜賣太倉的米，定了充發新疆的罪名。<sup>16</sup>

原因是先祖做《老殘遊記》，得罪了許多的滿清人——尤其是剛毅（正集第十五回所指的剛弼<sup>17</sup>），他們藉詞報私仇。

當時是滿清人的天下，還有什麼辯論的餘地嗎？

《老殘遊記》正集廿回同續集六回，最初是在《天津日日新聞報》上按日發表的。先祖稿子從北京寄來，當時家父就在報館做校對的事務。據家父說：

「正集第十一回中所談革命一段，先祖的原文，是引《易經》革卦象辭：『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贊成革命的意思，同上半回所說的數十年後文明結實，以至於大同，一氣下來的。

當時編輯的人，不敢發表，改用象辭：『澤火革，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並增加了一段，同原著的意思大有不同了。」

現在根據先祖的日記，1902年9月起，在北京為搜集龜甲文字的時期，1908年回南方，在上海蘇州南京一帶。

同年7月，因太倉案到迪化去了。

當時兩江總督端方，因同先祖為古董的爭執，也是陷害先祖的主要分子。<sup>18</sup>

1909年，先祖53歲，7月初8日因受風寒卒於迪化。<sup>19</sup>

<sup>16</sup> 譯者按：普實克譯文中，皆以「突厥斯坦」一詞指稱「新疆」，以「烏魯木齊」指稱民國文獻裡的「迪化」。本譯文一律採用「新疆」與「迪化」，以下不一一標注。

<sup>17</sup> 譯者按：此處普實克標示為「普實克注」，但實際上是劉鐵孫原注。

<sup>18</sup> 譯者按：劉鐵孫原文為「端午橋」，普實克取「端方」。劉鐵孫於此句末以括弧加注「已詳家叔在《論語》發表的文字中」，普譯文刪去此句。

<sup>19</sup> 譯者按：劉鐵孫原文為「因中風症卒於迪化」。普實克將「中風」誤解為「吹風受涼」。

先祖因為知道津浦鐵路通車後，浦口一定繁榮，曾在浦口買了一千多畝70多公頃地皮，其中捐助國家超過25公頃，建築浦口車站和貨棧。餘下30多公頃，1908年也被清朝充公了（現在歸南京市政府所有）。<sup>20</sup>

其餘的古董字畫，全被充公，大部分是端方納為己有。子孫雖想保存先人數十年心血的結晶，有什麼辦法呢？

署名劉鐵孫，劉鶚嫡孫，1935年2月28日。

劉鐵孫大膽且盡其所能地將祖父刻劃為革命家，而他心心念念的，無疑是那位於浦口的三十公頃地。<sup>21</sup> 這一片佔盡地利之便的土地，屬於（或者更精確地說，在1935年時曾經屬於）南京統轄。

至於劉鶚的友人羅振玉則是這麼說的：<sup>22</sup>

予之知有殷虛文字（普實克按：羅振玉是首位研究中國古代金石文字的學者，其所研究金石文字之年代大約是公元前十一到十二世紀），實因丹徒劉君鐵雲。

鐵雲，振奇人也，後流新疆以死。

鐵雲交予久；其平生事實，不忍沒之。

附記其略於此：

君名鶚，生而敏異。

年未逾冠，已能解析其先德子恕之策論。子恕，地方道員，諡

<sup>20</sup> 譯者按：普譯「70多公頃」，劉鐵孫原文為「一千多畝」；普譯「超過25公頃」，劉鐵孫原文為「四百餘畝」；普譯「30多公頃」，劉鐵孫原文為「五百餘畝」。

<sup>21</sup> 譯者按：1935年間，劉鐵孫正通過劉大鈞與蔡元培的關係，希望能向南京國民政府要求發還於清末被沒收的浦口地產。見劉厚澤為劉大紳〈關於《老殘遊記》〉一文所作的注釋。

<sup>22</sup> 譯者按：羅振玉的〈劉鐵雲傳〉一文，出自其《五十日夢痕錄》，全篇收錄於胡適〈亞東版《老殘遊記》序〉。普實克譯文之分段不同於胡適引文。本譯文從普文。

成忠，意為「至忠」。<sup>23</sup>

精通各種科學，<sup>24</sup>尤長於治河。

顧放曠不守繩墨。

而不廢讀書。

予與君同寓淮安（普實克按：位處江蘇省北），君長予數歲。

予少時固已識君，然每於衢路聞君足音，輒逡巡避去。

不欲與君接也。

是時君所交皆井里少年，已乃大悔。<sup>25</sup>

閉戶斂跡者歲餘。

以岐黃術遊上海，而門可羅爵。

則又棄而習賈；盡傾其資，乃復歸也。

1888年，<sup>26</sup>河決鄭州（普實克按：位於河南省）。君慨然欲有以自試，以同知往投效於吳恆軒中丞（普實克按：時任官於河南）。中丞與語，奇之，頗用其說。

君則短衣匹馬，與徒役雜作。

凡同僚所畏憚不能為之事，悉任之。

聲譽乃大起。

河決既塞，中丞欲表其功績，則讓與其兄渭清觀察（夢熊）而請歸讀書。

中丞益異之。

時方測繪三省黃河圖（普實克按：即河南、山東與直隸三省），命君充提調官。

<sup>23</sup> 譯者按：羅振玉原文為「年未逾冠，已能傳其先德子恕觀察（成忠）之學」。

<sup>24</sup> 譯者按：羅振玉原文為「精疇人術」。普實克譯文未明確指出此為天文曆算之學。

<sup>25</sup> 譯者按：羅振玉原文為「是時君所交皆井里少年，君亦薄世所謂規行矩步者，不與近。已乃大悔。」普實克刪去中間數語。

<sup>26</sup> 譯者按：羅振玉原文並列清帝年號與公元紀元。普實克僅保留公元紀元。以下不一一指出。

河圖成，時河患移山東，吾鄉張曜公方撫岱方。<sup>27</sup>

吳公爲揚譽，張曜乃檄君往東河。

張曜故好客，幕中多文士，實無一能知河事者。

群議盛讚賈讓（普實克按：賈讓爲漢代水利工程師）不與河爭地之說。然又反其道而行之，欲盡購濱河貧民地，以加寬河身。<sup>28</sup>

上海善士施善昌和之，<sup>29</sup>將移海內賑災之款助官力購民地。

君至則力爭其不可，而主束水刷沙之說。草《治河七說》，上之。

幕中文士力謀所以阻之，苦無以難其說。

時予方家居，與君不相聞也。

憂當世之所以策治河者如是，乃著論五千餘言，以明其利害。

欲投諸施君，揭之報紙，以警當世。

君之兄見而大韙之，錄副寄君。君見予文，則大喜，乃以所爲《治河七說》者郵君之兄以詒予，且附書曰：

「君之說與予合者十八九。群盲方競，不意當世尚有明目如公者也！但尊論文章淵雅，非肉食者所能解。吾文直率如老嫗與小兒語，中用王景名（普實克按：王景亦爲漢代知名水利工程師），幕僚且不知爲何代人，烏能讀揚馬之文哉？」

時君之玩世不恭尚如此。

1894年，中東之役起。

君方丁內艱歸淮安，予與君相見，與君預測兵事。時諸軍皆扼守山海關（普實克按：山海關位於北京東北方），以拱京師。

予謂東人知我國事至熟，恐陽趨關門，而陰擣劉公島（普實克

<sup>27</sup> 譯者按：羅振玉原文爲「吾鄉張勤果公（曜）方撫岱方。」普實克一律採用「張曜」一名。

<sup>28</sup> 譯者按：羅振玉原文爲「群議方主賈讓不與河爭地之說，欲盡購濱河民地，以益河身。」

<sup>29</sup> 譯者按：羅振玉原文爲「上海善士施少卿（善昌）」普實克一律採用「施善昌」一名。

按：近威海衛）與大連灣（普實克按：即大連）以覆我海軍（普實克按：位於直隸灣），<sup>30</sup>則我全局敗矣。

儕輩聞之，皆相非難。

君之兄且引法越之役（普實克按：1884-1885年）法將語，謂劉公島與大連灣難拔，以為之證。

獨君意與予合，憂劉、大且旦夕陷也。

乃未久竟驗（普實克按：1884年11月，<sup>31</sup>日軍攻陷大連。翌年2月，北洋艦隊於劉公島壯烈戰役後潰敗。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身負重傷，後服毒自盡）。

於是同儕皆舉予與君齒，謂二人者智相等，狂亦相埒也。

君既服闋（普實克按：子女須為過世父母服孝3年—雖然實際上一般僅服孝27個月—在此期間不可述官職），張曜卒官，代之者福潤，<sup>32</sup>以奇才薦。

乃徵試於京師，以知府用。君於是慨然欲有所樹立。

留都門者二年，謂扶衰振敝當從興造鐵路始，路成則實業可興，實業興而國富，國富然後庶政可得而理也。

上書請築津鎮鐵路，當道頗為所動。

事垂成，適張文襄公請修京鄂線，乃罷京鎮之議。

而君之志不少衰，投予書曰：

「蒿目時艱，當世之事百無一可為。近欲以開晉鐵謀於晉撫，俾請於朝。晉鐵開則民得養，而國可富也。國無素蓄，不如任歐人開之，我嚴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礦路歸我。如是，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

予答書曰：「君請開晉鐵，所以謀國者則是矣，而自謀則疏。」

<sup>30</sup> 譯者按：羅振玉原文為「而陰擣旅大以覆我海軍」。普實克誤將「旅」字解為劉公島。

<sup>31</sup> 譯者按：此為1894年之誤。

<sup>32</sup> 譯者按：羅振玉原文為「代之者福公（潤）」。

萬一事成，而萋斐日集，利在國，害在君也。」

君不之審。

於是事成而君「漢奸」之名大噪於世。

1900年之亂，剛毅奏君通洋，請明正典刑。

以在滬上，幸免。

時君方受廩於歐人，服用豪侈。

予亟以危行遠害規君。

君雖避之，不能改也。

聯軍入都城，兩宮西幸。都人苦饑，道殣相望。

君乃挾資入國門，議振卹。

適太倉為俄軍所據，歐人不食米，君請於俄軍，以賤價盡得之，糶諸民，民賴以安。

君平生之所以惠於人者實在此事，而數年後柄臣某乃以私售倉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

當君說晉撫胡中丞奏開晉鐵時，君名佐歐人，而與訂條約，凡有損我權利者，悉托政府之名以拒之，故久乃定約。

及晉撫入奏，言官乃交劾，廷旨罷晉撫，由總署改約。

歐人乘機重賄當道，凡求之晉撫不能得者，至是悉得之。

而晉礦之開乃真為國病矣。（普實克按：胡適刪去以下部分片段。<sup>33</sup>）

至於君既受廩於歐人，雖顧惜國權，卒不能剖心自明於人。

在君烏得無罪？

而其所以致此者，則以豪侈不能自潔之故。

亦才為之累也。

<sup>33</sup> 譯者按：普實克所說的刪節片段，其內容為「嗚呼！賣國以自利，世所詬為漢奸者且不忍為，而當道竟悍然為之，勢不至辛亥之變，舉三百年祖宗之天下而並售之不止。君既受竊鉤之誅，而彼賣祖宗之天下者且安榮如故也，然則莊生之言，甯為過乎？」

噫！以天生才之難，有才而不能用，執政之過也。  
懷才而不善自養，致殺身而喪名，吾又焉能不為君疚哉？  
書畢，為之長嘆。

以上引文足以刻劃劉鶚人格特質，無需另行贅言。胡適雖然竭力辯駁羅振玉的某些論點，但事實已經很清楚。

接下來的引文出自劉鶚之侄劉大鈞：<sup>34</sup>

先叔鐵雲先生以著《老殘遊記》及收藏骨董聞於世，而其在滿清末葉提倡維新，則知之者鮮。蓋先生提倡之方式不在作文問世，而在遊說當局。

以其長於辯才，故頗得當局信任。

當時政府興築鐵路，及以新法採礦，得先生鼓吹之力不少。

然以慈禧后極端守舊，近臣如慶王等，對於維新事業終不敢放手進行。

而先生則主張徹底辦法，利用外資，從事建設，以開發我國之富源。

懷抱既不得抒，遂與保皇黨聯絡（普實克按：保皇黨試圖推翻慈禧太后，幫助地位正統的光緒皇帝重取政權。保皇人士支持君主立憲，當中為首的包括了1898年的改革派，如康有為、梁啟超等），希冀光緒帝得復政權，各種新政皆可實施。

不謂保皇黨實力不允，計畫不能實現。

而先生反因此招當局之忌，致被放回疆，抑鬱而歿。

可嘆也！

當時凡提倡新法者，守舊派皆目為漢奸，故先生壯年在山東佐幕時，即有漢奸之名。

<sup>34</sup> 譯者按：此文題為〈劉鐵雲先生軼事〉，原刊於《人間世》第3期，1934年5月5日出版。普實克之分段不同於原文。本譯文之段落係根據普文。

是時張漢仙張曜撫魯，<sup>35</sup>本屬世交，且愛先生之才，延為幕賓。乃因提倡新法之故，致遭物議。

先生辭職進京，往謁李鴻章（普實克按：中國顯要重臣，官拜直隸總督，曾遊歷歐洲，雖走馬看花但觀察細膩卻又意帶嘲諷，一時喧騰）。文忠與先祖有年誼，故以子侄輩待先生。

甫晤面，文忠即謂：

「汝尚年少，初出辦事，乃被人罵為漢奸，將來如何能上進乎？」

先生答曰：

「小侄被罵為漢奸，事誠有之。然小侄年幼，辦事尚少，僅一小漢奸耳。老年伯勛績卓著，外間亦呼為漢奸，是乃老漢奸矣。小侄但能步老伯後塵，豈懼不能上進乎？」

文忠為之莞爾。

先祖子恕公在河南任兵備道多年，與曾國荃同事平捻（普實克按：事實上，曾國荃因戰事失利而被革職）。

功成致仕，寄寓江蘇淮安，與先父味青公皆提倡西學甚力。時淮安人尚無學歐西語言者。

先父年已三十，獨從天主教士習法文。

借此研究西學，尤精各類科學。<sup>36</sup>

家藏新舊書籍皆甚富，醫學術數之書亦有之。

先生幼年即隨意涉獵，天資極聰穎，故長於醫算。曾著醫書三卷，各含章節若干。<sup>37</sup>

<sup>35</sup> 譯者按：劉大鈞原文為「是時張漢仙撫魯（即《老殘遊記》中之莊撫台）」。普實克譯文取張曜之名，並刪劉大鈞於括弧中之注釋。又，「莊撫台」（莊宮保）在部分版本（如日日新聞本）中稱「張撫台」、「張宮保」。普實克文中亦稱其為張撫台。下文從之。

<sup>36</sup> 譯者按：劉大鈞原文為「尤精疇人之術」。普實克未明言此係指天文曆算之學。

<sup>37</sup> 譯者按：劉大鈞原文為「曾著《勾股天元草》、《弧三角》及《要藥分劑補正》各若干卷。」普實克未將各書名逐條譯出。《勾》、《弧》二書為算學



更因太谷學派中人喜談命運，故《老殘遊記》中頗多言天運及醫理之處。

今人有以北拳南革之預言甚為靈驗，頗異先生能洞燭機先者。其實先生留心政事，交遊極廣，想已早知清室頑固，迷信神拳，而南方人民革命思潮方醞釀中，大勢所趨，北拳南革，在所不免。

故托辭術數，預行警告國人耳。

若謂天干地支真能預決時事，吾不信也。

先祖乃科甲出身，故令二子習制藝。先生秉性不羈，闡墨本所不喜。復因先父研習新學，致會試落第，青衿終老，遂更無意於科舉。

蓋先父會試時，房官已薦列前茅，乃因策論中引用盧梭學說，主考官批謂「盧梭二字，不見經傳。」遂加磨勘。

足見當時科舉與新學格格不能相入。

先生果入闈，亦決無獲選之希望也。

先生藏骨董甚多，書畫碑帖，鐘鼎彝器，晉磚、漢瓦、泉布、印章，古代樂器，以及甲骨、泥封，無不搜羅。

以前收藏家對於甲骨、泥封未加注意，經先生收藏，復經王國維（普實克按：王國維，1877-1927，當代中國最知名學者之一，尤精於文字學）先生詳加研究，於古史多所發明。

三代（普實克按：夏、商、周三代。事實上，目前甲骨文字來源僅限於殷商晚期，亦即公元前十一到十二世紀）文字留傳至今，殊可貴也。

先生在北平、南京、蘇州、上海、淮安等處皆有房屋，分藏骨董書畫等，但以北平、南京、蘇州所藏為最多。

余幼時聞先生南京住屋有一室，其地與四壁皆以古磚古瓦砌

---

著作，並非醫書。又，劉大鈞所言之「《弧三角》」，實為「《弧角三術》」之誤。

就，其他骨董陳列尤多。

時端方為兩江總督，亦好收藏，時相過往，因艷羨先生所藏《劉熊碑》，欲以廉價強行收買，先生不允，嗣因不願結怨，以碑贈之。

然此後奏參革職，查抄家產，端仍為主動者之一。

先生在浦口本置有地產多項，因政府興築津浦鐵路，需地為建築車站碼頭之用，先生自動捐地數項。

及被參革，餘地亦皆充公，故家產蕩然，子孫皆自食其力以自給焉。

筆者對以上傳略需提出幾點評述。

從許多方面來說，劉鶚所做的努力，的確是與光緒帝身邊的改革黨人的規畫若合符節。然而，不管是在《老殘遊記》或者其它材料裡，都看不出劉鶚對改革派的政治目的有什麼更深入的興趣。

劉鶚重視實業活動高過一切。對於其它事情，他始終保持一種抽離且保留的態度，並且排斥激進的解決手段。若說他因為政治意見而被流放，似乎有點不合理。

根據劉大鈞的說法，劉鶚唯一因為改革傾向而被視為漢奸，其具體事實係見於佐幕山東期間，後因此辭職赴京。然而根據羅振玉所述，劉鶚係因母喪，又因巡撫愛才，將其舉薦於皇上，故而劉鶚離魯赴京。同樣地，我們也很難理解，為何僅因治水方式之爭（雖然看起來頗有此事），竟可使劉鶚背負漢奸罪名。

然而，就算一開始無漢奸之實，最後卻積非成是，尤其是當劉鶚主張任由歐人修築晉鐵，且「受廩於歐人」的那段期間。

由此可知，「小漢奸」劉鶚拜晤「老漢奸」李鴻章之軼聞（如果真有此事的話），應發生在晉鐵事件之後。

特別有意思的還有以下這段文字：「因太谷學派中人喜談命運，故《老殘遊記》中頗多言天運及醫理之處。」

根據這段文字可以推論，劉鶚應與「太谷學派」過從甚密。這個教派當時廣為傳播，卻也飽受打壓。劉鶚藉黃龍子之口表達出他個人的意見，而這些意見正好也反映了上述教派的教條界律。太谷學派主要的論述基礎，是認為儒、釋、道三教原理相同。此外，黃龍子有一番關於善惡相抗衡卻又共生的論述。<sup>38</sup> 其論述也是淵源自太谷學派，而又與波斯宗教的教義明顯雷同。由於資料欠缺，筆者暫無法深入探究這些教義之間的相互關聯，但筆者認為，這些相關論點，其實都源自曾在中國流行一時的明教。明教的廣為傳播，使得某些闡述善惡二元論的教義，甚至被道教所吸收，寫入道教經典，為信徒所推崇。總而言之，太谷學派信仰在民間非法流傳甚廣。研究太谷學派甚至有助於釐清許多中國歷史上的問題。事實上，隨著中國歷史腳步進展而發生的種種叛變與革命，多從太谷之學汲取養分。

筆者在此還想指出，王韜為《浮生六記》所作的〈跋〉裡，可以發現一些特殊觀點，與希臘神話其實相當接近。王文寫於1877年，與《老殘遊記》出版時代相距不遠。王韜的論點與中國哲學思想頗有差異，例如他提到了造物主，以及有才有色之人多為造物主所忌等等。<sup>39</sup>

中國社會接受外來宗教教義自有其靈活變通之處，以至於這些教義會以一種容易理解且合於傳統的方式呈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太平天國。他們的教義基本上是源自基督教。

太谷學派起於十六世紀的明代，距離另一個秘密宗教白蓮教推翻明王朝（1644），只有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太谷學派由李兆恩所創，傳授儒、釋、道三教合一之說。起初人們稱其信徒為「大成教派」。道光年間（1821-1850），此一學派由周太谷承繼，推廣不遺餘力，而

<sup>38</sup> 譯者按：見《老殘遊記》11回，黃龍子關於上帝與阿修羅的「勢力尊者」之說。

<sup>39</sup> 譯者按：見王韜「婦之有才有色者，輒為造物所忌，非寡即夭」；「乃後之人憑吊，或嗟其命之不辰，或悼其壽之弗永，是不知道造物者所以善全之意也」；「造物所以忌之，正造物所以成之哉？」等言。

這也正是太谷學派的名稱由來。周太谷字「星垣」，也就是星象羅列之義。太谷學說的信徒眾多，鮮有其它教派可匹敵。但當時正好也是清政府禁止結社最嚴格的時期。周太谷遂被兩江總督下令逮捕，後卒於牢獄，弟子將其學說集結為《太谷經》。太谷學派後分裂為南北兩宗。北宗以張積中為首，後於山東肥城境內的黃崖，與近千名信徒共同以烈火自焚而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老殘遊記》裡，劉鶚將申子平與黃龍子的相見場景設定在緊鄰肥城的平陰縣。書中所說的山脈，綿延於肥城、平陰兩縣之間。劉鶚很有可能是要藉黃龍子之口闡述太谷學派的教義；而黃龍子的形象，其實也就是用來暗指居住在此一地區的太谷賢人，甚至可能是張積中本人。通過這樣的表現方式，劉鶚為張積中譜寫出一幅理想的人格形象。

劉鶚作品之所以有著特殊的重要性，於此可見一斑。因為它觸及了對群眾具有影響力的重要人物，而正是這些人物決定了中國的歷史的步伐。這樣的題材在一般中國文學作品裡非常罕見。

可惜研究中國文學史的學者們，迄今對這些問題甚少談論。筆者期望能在未來，進一步分析相關的問題。

關於劉鶚的生平，最後還有件事值得一提，也就是他發現了中國最古老的書寫系統甲骨文。劉鶚發現的殷商時期（約西元前十五世紀至西元前十一世紀）甲骨文，不久後讓他譽滿天下。羅振玉在其書中特別強調了此事。

河南北部的安陽附近，有個小屯村。十九世紀的最後十餘年間，小屯村北邊的農民們在耕田時，常會發現一些外形獨特卻殘缺不全的龜甲獸骨。農民們把這些甲骨賣給中藥商，標榜其為「龍骨」。

一直到了1899年，山東古董商范維卿才發現這些物品的考古價值，將其贈予知名收藏家端方（劉鶚的勁敵）。另外還有一位王懿榮，對甲骨也頗有愛好。他於庚子拳亂期間被處決。

1902年，也就是《老殘遊記》開始撰寫的那一年，劉鶚蒐購了

范維卿、王懿榮收藏的甲骨，加上他自己從別處所購得者，收藏甲骨總數達到五千片。同年，羅振玉（前述劉鶚生平傳略作者）逐一鑑識了劉鶚所有收藏。1903年，劉鶚拓印所藏甲骨中的一千五百片，出版《鐵雲藏龜》一書。書中輯有羅振玉序，是中國首篇關於甲骨文的研究。至於劉鶚，則在書中詳述了發現甲骨文的來龍去脈。

除了羅振玉之外，知名學者王國維同樣也對甲骨文有所鑽研。

根據學者研究發現，這些甲骨為殷商晚期（西元前十二至十一世紀）的卜筮工具。王室的占卜者將祈問神鬼之事契刻於龜甲，將龜甲鑽孔並置於火上炙烤，而後根據龜甲受熱所產生的裂紋解讀神鬼之意，將答案契刻於同一片龜甲後，將其收藏入庫。

龜甲獸骨上的甲骨文，是中國最古老的契刻文字，在中國書寫史上相當重要。

專家學者在安陽週邊持續開挖，發現了殷墟遺址全貌。在此之前，人們所知的商代歷史，僅局限於概略的王室譜系資料。殷墟出土，讓許多關於殷商文明的重要檔案得以重見天日。

中國古代的歷史，從此有了一盞引路明燈。其中一部分的功勞應當歸於劉鶚。他是人世間的天才。（普實克按：相關的考古史，可參見漢學家顧立雅《早期中國文明研究》一書，1938年倫敦出版，頁1-18。）

## 五、

1898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這段期間，中國小說蓬勃發展。根據阿英估算（普實克按：前揭書，頁1），當時包括譯自歐語（其中不乏許多自由發揮改編者），以及中國本地自創者，共計有1,500種小說出版。

小說文類之所以繁榮發展的原因有許多。一方面，西方現代印刷機器傳入，中國的印刷技術因此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則是時人普遍

有個相當特殊的觀念，認為小說裨益良多，甚於其它文類。最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革命前夕風雨欲來的時代感，在在刺激著當時人們的精神狀態。

梁啟超，1898年百日維新的主導人之一。梁在著作中論及小說的功能，其論點正好反映時人的觀念：「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普實克按：見阿英，前揭書，頁2。）

根據梁啟超的說法，國家命運的方方面面，無一不是受到小說影響。

梁啟超肯定甚至誇大了小說的功能。說得更準確些，「大聖鴻哲數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小說「一二書敗壞之而有餘」。

當時的知識分子們多秉持同樣想法。見時政與社會動盪不安，國家搖搖欲墜，士子文人以此為主題創作問題小說，藉此宣傳其觀點與意見。這個時期的小說呈現驚人的多樣性，反映出各種不同的意見，從根深柢固的保守派到極端革命的信徒都有。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的作者並不贊同與過去徹底決裂。相反地，他們倡議循序漸進的演變，對清政府也未滋生任何敵意。他們雖然痛批官員貪贓枉法，並要求中國政府以更堅定的態度，反制列強的強取豪奪，但是他們拒絕激進的革命手段。

從這個方面來說，劉鶚跟當時大多數人的態度一樣。

除了批評時局以外，還加上臧否時人。這個時期的中國小說裡，有許多針對個人的明嘲暗諷，其發展程度可說遠超過其它任何國家。不管是政要官吏，或是作者的朋友與敵人，都在小說裡登場，其人格的高下優劣，完全攤在讀者眼前，任人評斷。

如果沒意識到這個面向，就沒辦法充分理解劉鶚的小說。

劉鶚圖的是什麼？既涉足政治又兼具工程長才，並且還是收藏家的劉鶚，究竟為了什麼目的而投身一本小說的創作？

從當時整個時代的大環境來看，小說的主旨似乎是要「剖心自明

於人」，與羅振玉一抒胸中塊壘。

《老殘遊記·自敘》與全書第一回裡頭，對此皆有著墨。書中痛陳世局對老殘的不公，將其視為漢奸。<sup>40</sup>而事實上，老殘正是作者的自我理想典型。

作者將老殘的主要才幹一一道來：他治好黃瑞和（暗指黃河）的病，並且竭盡全力保護中國這艘陳舊的大船，借鑒西方現代科技之所能，使其免於災難。

作者將老殘描述為神醫，強調老殘的治病良策源自大禹。根據中國民間傳說，帶有神祕色彩的大禹擅於治水，使中華大地免受水患之苦，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此外，老殘師法漢代知名水利專家王景，以「束水刷沙」的疏導方式治水。在後續章回裡，作者會提到另一位治水者名叫賈讓。賈讓「不與河爭地」的治水法與王景恰恰相反，但卻是當時最廣為接受的治水法。

劉鶚筆下所描寫的帆船雖然只是個比喻，但意指清晰，用來含括整個中國。船身二十三、四丈，代表全國18行省，加上臣屬大清的西藏、新疆等地。專管掌舵的四人，意指清政府高層掌權的軍機大臣。船上的六扇舊帆代表六部尚書，兩扇新帆則代表新近設立的政府部門，例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船身嚴重損壞，東邊有一塊三、四丈長短的裂縫，代表日、俄兩國控制的東三省（今滿洲）。另外一塊一丈長的裂縫，代表的則是山東，當時隸屬日本及其它列強的勢力範圍。

搜刮剝削船上旅客的水手，意指低階官吏。在革命黨人的鼓動下，人們群情激憤，意欲反抗。這些革命黨人早前曾避難東瀛，以確保自身安全。

老殘文學涵養深厚，才德兼備。所以書中說，老殘有兩名摯友，一

---

<sup>40</sup> 譯者按：在〈自敘〉裡，作者痛言：「吾知海內千芳，人間萬豔，必有與吾同哭同悲者焉！」而在第1回裡，老殘欲獻西式向盤與紀限儀以救沉船，卻被船上的下等水手稱之為「洋鬼子差遣來的漢奸」，就連「演說的英雄豪傑」，亦將其視為「賣船的漢奸」。

是文章伯，一是德慧生。中文裡「德慧」的意思就是指美德與智慧。

水手們使用的向盤、紀限儀等測量工具，都來自西方現代科技。就像修鐵路、開礦藏一樣，這些西式科技是劉鶚用來「配備」中國的。然而，老殘的意圖卻被曲解，船上的人們將他視為漢奸，把他扔進大海裡。幾年以後，《老殘遊記》出版。劉鶚遭受到的打擊就像老殘一樣。

除了為老殘的人格辯解之外，作者也懂得利用各種機會，表達各方面的意見。中國學者的評論指出，本書最重要的議題，就是有才的做官比無才的做官更壞，而清官比臧官尤可恨。這個與時人意見相左的觀點相當有意思，因為同一時代的小說多猛烈抨擊士子貪贓之禍。

對於清官、能吏的批評，可歸結到作者對宋代理學的反感。宋代的知識分子往往在閱讀經典時，藉由個人先入為主的觀點強作解人。十八世紀以來，大多數研究聖賢經典的思想家與詮釋者開始反對這種教條式的解讀。劉鶚的立場也是如此。不過，從書中倒看不出劉鶚是否完全明瞭宋代理學的形而上層面，或者完全理解宋儒的哲學體系。劉鶚所關切的，顯然並不是哲學理論，而是受到宋儒教條影響而逐漸淪為形式主義、脫離現實的道德教化，也就是他所謂的「吃人禮教」。<sup>41</sup> 對深具浪漫情懷的劉鶚來說，這種吃人禮教絕對難以忍受。劉鶚認為，古聖先賢的教誨原本簡單清晰而富有生命力。他要以此對抗繁瑣的教條形式主義。

然而，作者最根本的目的之一，無疑是要諷刺他個人的政敵。這些政敵不但反對劉鶚的諸多實業計畫，最後甚至還在庚子拳亂期間，讓劉鶚一命嗚呼。這就是書中所影射的清政府官員剛毅。

《老殘遊記》裡大多數的角色，尤其是作者大力抨擊者，皆取材

<sup>41</sup> 譯者按：普實克「吃人禮教」一語出處不明。普氏曾於1937年出版魯迅《吶喊》的捷克文譯本，是否因此有所關聯，不得而知。另外，胡適亞東版《老殘遊記》〈序〉一文言：「戴東原說宋儒的流弊遂使後世儒者『以理殺人』；近人也有『吃人的禮教』的名言，這都不算過當的判斷。」此處普實克是否引用胡適此文，待考。



自真實人物。他們幾乎無一例外，都是極端保守主義圈子裡的人，其中不乏政府高官。這些官員甚至在國家發生民變時，與那些迷信且無知的信眾站在同一陣線。小說中的人物雖然都用假名，但明眼人立刻看穿，因為作者通常是根據人物本名的同音字予以重新命名。作者這個方法的目的很明顯，就是爲了要讓讀者可以對號入座。

山東巡撫張曜在小說裡，是以張撫台的身分出現。作者將他刻劃得非常親民，但同時也突顯他的軟弱；縱然宅心仁厚，但終究不免受幕府中人欺瞞玩弄。作者同時也揭露了其對手的治水計畫之不可行。在小說第二回與撫台會面時（頁33-34）對此已有述及，特別是在兩個妓女的片段（頁169-179）中，<sup>42</sup>更說明治水政策錯誤之貽害。小說中提到一人名為史鈞甫，是黃河拓寬河床計畫的主要支持者。此人即影射上海善士施善昌。<sup>43</sup>前文所引羅振玉文曾言及此人。

作者難以平息的忿恨，主要針對兩名酷吏，也就是王賢與剛弼。<sup>44</sup>在第一版《老殘遊記》裡，王賢被稱爲玉賢，其欲影射者即爲毓賢（玉字與毓字同音）。毓賢極度仇外與反基督教，是義和團的鐵桿支持者。1900年庚子拳亂期間，毓賢任山西巡撫。在其治下，山西太原發生了慘絕人寰的中外基督徒大屠殺事件。庚子亂平後，清廷在歐洲列強的壓力下，於1901年2月22日將毓賢處決。

爲了表達對毓賢的不滿，作者還編寫了一首〈銀鼠諺〉（頁120）。<sup>45</sup>這是一首以預言方式表現的諷刺詩歌。

「東山乳虎」，所指即爲毓賢。「東山」即爲山東省（中文裡意指「在山之東」）。「麝」（音近張）代表的可能就是巡撫張曜。「乳虎

<sup>42</sup> 譯者按：與張撫台會晤之情節，出自第3回。兩個妓女之片段，指的是第13到14回。

<sup>43</sup> 譯者按：普實克此說顯然是受了胡適的影響。見胡適亞東版《老殘遊記》〈序〉：「羅〈傳〉中的施善昌大概就是《遊記》第14回的史觀察」。

<sup>44</sup> 譯者按：「王賢」於普實克文中標示爲“Wang Hsien”。可能是其參考版本有「王」、「玉」混用之情況。

<sup>45</sup> 譯者按：見第十回。

食麇」，意思就是說毓賢於 1899 年取代了張曜的職務。「悲生齊魯」，齊、魯為古代州名，亦即今天的山東。「殘骸狼藉」，意思是說毓賢因山東拳亂引來外國勢力關切，被清政府撤職，由袁世凱替之。乳虎「飛騰上天」，意指毓賢返京後晉見皇帝，<sup>46</sup>上達天聽。「立豕當國」，意思是任命豬為政府官員。此處影射剛毅。他是義和團的主要支持者，也是劉鶚的死對頭（「毅」字在中文裡，是由「立」和「豕」所組成的。「立」的意思就是建立、授與職位，「豕」的意思就是豬）。乳虎「雄據西山」，指的就是毓賢被任命為山西巡撫（山西的意思就是「在山之西」）。「亞當孫子，橫被摧殘」，意指毓賢任內屠殺基督徒之事。「四鄰震怒」，即指歐美列強與日本合組八國聯軍侵華。「天眷西顧」，意指光緒帝與慈禧太后西狩，走避西安府。「斃豕殪虎」，是說毓賢被處決，而剛毅在西狩期間身故，死後被清廷追奪所有官職。

這首預言詩中所影射的剛毅，在小說裡的名字叫做剛弼。剛弼是典型的清官，其頑固與殘忍，在審理魏氏父女案的章回中可見一斑。他意圖指控老殘（也就是作者本人），<sup>47</sup>最後卻被反將一軍，被迫承認老殘清白。面對意欲置他於死地的對手，劉鶚最終獲得了勝利。至少在小說裡，他是獲勝了。劉鶚在公堂上訓斥剛弼的字字句句（普實克按：頁 208-212），在在體現出劉鶚見敵手潰敗時的無限快慰。

剛毅與剛弼的身分問題，在胡適書中完全被遺漏（普實克按：見胡適，前揭書，頁 807）。胡適的解釋恐有誤，因為他並未試圖解讀〈銀鼠諺〉的涵義。

《老殘遊記》一書的形式，以及為何本書區分為兩大主要部分，這些問題都可以從作者嘲諷兼批評的傾向得到解釋。本書第一部分主要處理酷吏王賢，藉以影射毓賢。第二部分以魏氏一案為重心，藉此

<sup>46</sup> 譯者按：應為慈禧太后。

<sup>47</sup> 譯者按：見第 18 回，剛弼認為老殘與魏老勾結，便對白太守說：「聽說有個什麼賣藥的郎中，得了他許多銀子，送信給宮保的。……聞聽說這個案子如果當真翻過來，還要謝他幾千銀子呢，所以這郎中不走，專等謝儀。似乎此人也該提了來訊一堂，訊出此人贓證，又多添一層憑據了。」

影射剛毅。在黃河氾濫的章回裡，劉鶚也將他對施善昌的不滿，毫不避諱地攤開在讀者面前。

令人詫異的是，儘管《老殘遊記》的特點在於個人主觀意見，時有不協調感，但全書並未在作者筆下變得支離破碎。相反地，全書表現了相當緊湊的整體感。

作者的才華顯然戰勝了劉鶚個人的愛恨情仇。

此外，老殘的友人也極有可能取材自實際人物。問題在於，相較於前文述及的知名政界人物，若要辨識這些友人的身分與其之間的交情，恐怕要困難得多。儘管如此，筆者仍然在前文裡，試著辨別黃龍子的角色原型，及其與太谷學派大師之間的可能關聯。

作者將現實人物的生活予以小說化。我們看似繞了一大圈研究作者如何影射時人，但其實有助我們釐清劉鶚的藝術手法。或許只需要再強調一點，也就是作者原本是在朝廷遇見他筆下這些人物的原型。而在小說裡，作者讓這些人物離開北京的風風雨雨，根據故事主角的遊記路線，安排他們在各種不同的場景出現。

同時代的其他作家，也樂於擷取知名人物的生活軼事或經歷，予以發展成小說題材。但他們從來沒有嘗試過像劉鶚這樣的提煉再創作。

接下來的幾點評述，是處理老殘與作者之間的關聯，目的是希望能釐清劉鶚的寫作方法。

## 六、

老殘的真實身分就是劉鶚。在這一點上，胡適與阿英意見一致。胡適是這麼說的：「老殘即是劉鶚先生自己的影子。他號鐵雲，故老殘姓鐵。」（普實克按：前揭書，頁796。）

阿英的意見與此相同：「老殘是代表了作者自己，可是這自己，是指的實體的劉鐵雲。他還有一個理想之身，也託附在書裡的異人身上，那就是初集（普實克按：筆者所譯）裡的瓊姑，二集（普實克

按：共計六回續作）裡的逸雲。」（普實克按：前揭書，頁23）

總的來說，老殘代表的就是劉鶚。如前文提過的，小說《老殘遊記》帶有自我辯解的特色，所以必須讓書中人為作者聲口。在作者〈自敘〉裡，作者毫不隱瞞地把自身珍視的德行歸於老殘，並且直白地呈現出他在官場遭受的不公不義與人情冷暖。

通過老殘，作者表達其個人在各種議題上的不同意見。除了老殘以外，作者還有其他的代言人，像是瓊姑、黃龍子等。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翠環也是。在相關片段裡，作者批評了時下流行的庸俗詩詞。<sup>48</sup> 這類詩自中世紀以來風行全中國，歷久不衰，內容多半是關於歌妓調情作樂之事。

劉鶚的諷刺小說需要一個主角，將看似鬆散的情節貫串成整體。這是同時期作家使用的兩種方法之一。它讓作家便於廣泛蒐羅當代社會的林林總總，將書中人物的奇遇與經歷介紹給讀者，而這種種奇遇與經歷往往又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例如李伯元（1867-1906）小說《官場現形記》的中心主題，正是書中主角的旅程見聞。另一位知名小說家吳沃堯（1867-1910）所創作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也是以此為書中故事的出發點。作者以「九死一生」為化名，在書中敘述了二十年間經歷的事件；至於「九死一生」代表的是誰，其實再清楚不過。

這種寫作模式及其所欲達到的目的，在另一位知名作家曾樸的作品裡體現得相當清楚。曾樸在小說《孽海花》的序言裡指出，本書靈感來自其友人所起的草稿。這位友人「過於注重主人公」，於是「不過描寫一個奇突的妓女，略映帶些相關的時事」。<sup>49</sup> 但是《孽海花》

<sup>48</sup> 譯者按：見第13回。翠環認為老殘的詩與眾不同，並說她過去所知道的時人詩作，不外乎是兩個主題，「體面些的人總無非說自己才氣怎麼大，天下人都不認識他；次一等的人呢，就無非說哪個姐兒長得怎麼好，同她怎麼樣的恩愛。」

<sup>49</sup> 譯者按：普實克此處係轉引阿英《晚清小說史》之言。阿英所引述的係1927年改本《孽海花·序》，而非1905年出版的版本。

作者想追求的目標卻完全不同：「想借用主人公作全書的線索，盡量容納近三十年來的歷史，避去正面，專把些有趣的瑣聞軼事，來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較的廓大。」曾樸提出了一個清楚明確的模式，而這種創作的手法，事實上在《老殘遊記》裡也看得到，也就是藉由主角的生活經歷，將題材各異的片段串連起來。

另一種寫作手法在當時也是非常流行，稱之為「環狀」模式。小說先從某甲的故事開始說起，當某甲的故事將近結束時，某甲遇到了某乙，然後某乙成了小說接下來的主角。整本小說的發展一環接一環。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就是採用這種手法。阿英對此書的評價高於同作者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上述兩種寫作方法，在古代中國文學裡已有之。第一種寫作手法在公元前已經出現，主要是一些小說形式的故事。第二種寫作手法則可見於一些冒險犯難的俠義故事，在中世紀相當風行。晚近以來的中國小說，尤其是愛情小說為最，其寫作手法變得比以前複雜，而且也吸收了歐美小說的慣用手法（可參見中國最著名的小說《紅樓夢》）。

十八世紀的大作家吳敬梓（1701-1754），在小說《儒林外史》裡，意圖針砭社會上的讀書人群體。他採用古代小說的環狀結構法，以便於在最大程度上觸及各種不同嘴臉的讀書人，好對這個社會階層大肆批評一番。胡適認為，《儒林外史》的寫作模式為晚清所有小說沿用，因此可以將其視為同一流派。不過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未免過於武斷。要想證明本文討論的作者是否真的都模仿吳敬梓，或許不太容易。這麼說可能會更準確點些，也就是各種平行發展的趨勢，最終演變成相類似的寫作手法。

在西方文學裡，也有跟中國小說同樣的題材趨勢與創作手法。社會小說就是一例。不過，西方作家並不使用線性接續的敘事手法，而是把各種同時發生的線索穿插交織在一起，以致於我們在讀起來的時候，感覺像是從單一視角看出去的馬賽克鑲嵌。不管是上述哪一種方法，目的其實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讓作家筆下的某個社會或地域群

體，躍然於讀者眼前，呈現其眾生相。儘管如此，中國小說的寫作手法到底還是比較原始，因為中國作家還不會使用多條情節並行的敘事結構。（普實克按：關於中國小說的這個特點，見拙文，收錄於《文字與修辭》1939年第5卷，頁204。）

從情節架構的觀點來看，這就是老殘這個人物的功用。然而老殘的一生，卻完全不能跟劉鶚相比。作者讓老殘扮演的角色是街頭鬻藥維生的郎中。這在中國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行業，頂多比戲子或江湖賣藝的人好一點兒而已。

書中主角在本質上有個特點，就是他的謙遜，拒絕所有旁人外加的榮譽。人們期望老殘不要埋沒才能，半推半就要他出任官職。他卻兩度在總督跟前開溜，為的就是不要進入官場。劉鶚提醒讀者，老殘的行為在歷史上有先例可循。例證之一就是「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圯而遁之」。<sup>50</sup>

從這個小細節可以看出，劉鶚細膩地掌握了老殘心態傳統的一面，而這種人物性格在以前的小說裡都不曾有過。

現實方面來說，老殘身上所體現的，或許是中國文學裡最古老的理想。人，應該獨善其身，離群索居，避開所有的榮耀與責任，寄情於自我內心的愉悅。中國人把這種人稱為「藏智」，並將其比作潛居地心深淵的龍，擁有無上的力量與才能。在中國人的眼裡，這種遠離俗世的心態，體現出超凡的智慧。它與老子的道家思想密不可分，在《道德經》裡已基本成形，而莊子的一則小故事更完美解釋了這種不願出仕的心態：「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

<sup>50</sup> 譯者按：見《老殘遊記》第六回：「宮保一定要先生出來做官，先生卻半夜裡跑了，一定要出來搖串鈴。試問，與那鑿圯而遁，洗耳不聽的，有何分別呢？」普實克所引文字並非直接出自《老殘遊記》，而是引用《淮南子·齊俗訓》，也就是「鑿圯而頓」一詞的典故。

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sup>51</sup>

這樣的理想浸潤了從古到今的中國詩文，並且是中國繪畫最美的題材。在許多作品裡，只見鄉野山林，湖面霧氣氤氳；智者、山樵或漁民形單影隻，獨行而不與人世爭。

不妨把《老殘遊記》倉促的結尾與另一本知名小說《水滸傳》互相比較。現有歐語譯本《水滸傳》係根據十七世紀的70回刪節本，與原著的結局不同。筆者此處所指的是成書於十六世紀的120回版本。在這個版本裡，一百零八條好漢接受朝廷招安，進官加爵。其中最讓讀者有好感的，也最接近作者心意的人物，當推浪子燕青。正當其他弟兄望京師進發時，只見燕青突然向主人說，「欲同主人納還原受官誥，私去隱跡埋名，尋個僻靜去處，以終天年。」主人拒絕這麼做。於是燕青「當夜收拾了一擔金珠寶貝挑著，竟不知投何處去了。」燕青是書中唯一一個全身而退者。其他留在皇帝身邊的弟兄，沒一個是好下場。人生艱難的這一課，在《水滸傳》的結局裡，表現得簡練清晰卻又力道十足。

劉鶚在書中是把道理歸結出來了，但是作者卻沒辦法讓自己的生命將就於這番道理。或者說，命運合該如此。儘管羅振玉以「危行遠害規君」，但劉鶚「不能改也」。

筆者以為全書最吸引讀者之處，應該是作者透過何種方式勾勒老殘的人格特質，以及老殘這個人物，如何為作者這樣的知識分子群體代言，體現出個人生命最崇高的理想。《老殘遊記》實現了中國人心中最珍視的夢想。這番情操或許有時過於神祕莫測，有時與現實生活差距太大。劉鶚在書中已經把這些成分淡化。他將老殘描繪為一個有分寸，並且思維理性的人物；他的內心充滿浪漫情懷與品味，但同時也知道如何與現實生活的嚴峻相調和。老殘雖然有著道家的思想，但

---

<sup>51</sup> 譯者按：典出《莊子·秋水》。

本質上仍然是位儒者。或許也可以這麼說：通過老殘身上所形成的氣質，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化裡兩種理想典型的完美融合。

然而，讀者會在老殘身上感覺到某種矛盾。作者需要的是一個堅守傳統價值、人格清白、克己復禮，並且高度具有人文關懷的角色，以此來突顯出其對手的蠻幹、殘虐與驕橫。但是作者有時著墨過重，過度渲染時人對老殘才幹的崇敬。小說一開始就教人費疑猜，為何濟南府上上下下的政府官員會眾口同聲向巡撫薦舉一位名醫，彷彿除了看病以外，社會上其它各種疑難雜症也難不倒他。老殘與莊撫台會面後，未留在撫署用餐，莊撫台於是遣了一名巡捕，給老殘送來了酒席，讓掌櫃的驚呼：「像這樣尊重，俺這裡是頭一回呢！」老殘的書簡一封，足以讓賈魏一案案情大逆轉。另外還有一個細節也發生在同樣一段故事裡，是身為貴客的白太守強推老殘在筵席坐上座，而老殘也答應了。作者見到（代表作者本身的）老殘的成功，顯然滿心歡喜，以致於作者可能忘了老殘在此之前扮演的人格形象。結果這一筆細節不但改變了老殘的形象，也讓整部小說的主旋律走了調；小說結尾劇情急轉，讓兩個不協調的元素收攏在同一個平面上。按羅振玉的說法，劉鶚真實的人格使其「慨然欲有所樹立」。然而，作者的理想人格與其真實的人格之間，顯然存在著不可磨滅的差異。而正是在白太守設宴這個小插曲裡，讀者可以清楚測度到此兩者之間的差異。

無論如何，筆者完全不認為劉鶚唯一的目的就是為了表現其個人正直，以及他對所有榮華名聲的鄙夷，藉此讓自己顯得比對手高一等。在小說所描繪的人物中，凡是筆鋒流露作者好感的，不外乎都體現了「藏智」的理想，透過一種接近道家理想的方式來呈現。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胸襟開闊坦率卻神祕藏於深山的璵姑、黃龍子、名聞綠林卻只願務農的劉仁甫、神機妙算的安貧子，以及青龍子等。遠離凡俗，在深山群壑間神遊妙境，這就是作者夢想中的愜意人生，哪怕其現實生活裡總是瑣事纏身，不但得面對政治對手無情的競爭、與西方人討價還價，而且功成名就的欲念盤繞不去。劉鶚人格的複雜程度，



在羅振玉所寫的傳略裡亦可見端倪。

一本寫實的小說裡，為何不時穿插一些怪異的元素？或許上述的角度是唯一解釋方式。故事情節突然從山東的小村落跳躍到深山裡的神祕道觀，讀者無從判斷究竟登場的人物是真人或神鬼。作者的許多指涉，只是徒然加深這種不確定感。事實上，中國文學裡有一個非常常見的主題，就是在旅途中巧遇神鬼云云。或者更精確地說，故事裡總有位年輕書生，客途深夜誤闖仙姑或女鬼宅邸。這類故事中最著名者，莫過於公元七世紀由張鷟撰寫的唐傳奇《遊仙窟》。誠然，劉鶚需要一個如幻境般的場景，藉以陳述他的神祕主義理論，並且借用預言作為外衣，包裝他的政治意見。然而，之所以會有這些內容，原因並不僅限於此。從許多方面可以看出作者對神祕、超自然事物的愛好，諸如他與祕教團體太谷學派之間的關係，以及書中一些片段，例如與綠林好漢的良好關係、少林寺拳法、毒藥千日醉的神奇故事（這又是另一個中國文學常見的主題）等。上述細節，皆有力證明了作者對神祕事物的愛好。

從極度寫實倏忽跳躍到怪力亂神，這個猛然的轉折顯示了劉鶚心靈的兩個面向：一方面，他正經務實的理性，讓他終其一生鼓吹國人吸取歐洲現代文明；另一方面，他對事物多變的胃口，讓他不甘於走上前人鋪好的順遂道路。從他的小說可以看出羅振玉的觀察不假：「顧放曠不守繩墨」。而正是這些介於現實與想像之間、出乎讀者意料之外的章節片段，讓《老殘遊記》有著獨樹一幟的趣味。

## 七、

在前一段裡，筆者提到幾個關於《老殘遊記》結構的元素，而正是這些元素，將《老殘遊記》與同一時代的其它作品聯結起來，並將其納入中國小說的演進通史中。然而，《老殘遊記》裡的魏案相關內容，卻顯示出歐美推理小說的影響。其實作者自己也不避諱。所以白

太守嘉許老殘說，「這種奇案，豈是尋常差人能辦的事？不得已才請教你這個福爾摩斯呢！」<sup>52</sup>從其它的研究材料可以得知，當時許多歐美推理小說都譯為中文，並且席捲讀者，蔚為風潮。這些翻譯的歐美小說延續了中國古代公案小說與民間故事的傳統。「公案」的意思就是指法庭上的事件。筆者在《文字與修辭》發表的拙文裡業已指出，自十三世紀以來，中國已經出現一種固定的文學體裁，且完全符合歐美推理小說的標準。但是自此之後，這種文學體裁並未有所演進。中國讀者喜歡看的是一種較為原始的類型：主角是明鏡高懸的青天大人，而由於他的智慧，即使案件千絲萬縷也能迎刃而解。在《老殘遊記》裡，讀者可以感受到類似的小說與民間故事的影響。短短不到一個時辰裡，白太守就解決了一樁棘手難題，斷案之快宛如神助。然而發現兇手的過程，卻又與歐美推理小說的手法如出一轍。當然，歐美推理小說有時候也會在傳統的影響下，產生相當大的變異。

研究中國文學史的學者，不管研究專長是哪個年代，通常認為中國只有吳沃堯的《九命奇冤》原則上應用了歐美推理小說的技巧。筆者認為，劉鶚也在這方面做出某些努力，甚至影響了後來的創作者，在許多不同類型的題材裡都可以看到。

也就是說，除了傳統的手法之外，劉鶚的風格呈現出相當新穎且獨特的元素。中國的小說家通常第一看重的是對話。書中人物的不同性格，會經由不同的說話方式表現出來。捷克偉大作家恰佩克（Karel Šapek）在其故事集裡用的也是這個手法。中國作家擅長透過語言裡細膩且微妙的差異，來表現不同人物的性格、行業、文化教養，乃至於該人物在小說中合該扮演的角色。中國文字書寫系統不同於西方語言。它無法直接訴諸純語音的元素，像是俚語的發音或者方言等，所以可說簡化了作家的任務。不同人物之間的語言細微差異，端賴語彙的不同來表現；或者在某些罕見的情況下，是透過不同的語

---

<sup>52</sup> 譯者按：見第十八回。

法結構來表現。通過類似的處理方段，劉鶚得以區分不同人物所使用的語言，從士子文人的應對進退，乃至衙門捕快的粗人快語都有。而由於這些不同語言之間的微妙差異，也就使得譯者的工作難上加難，因為在所有歐美語言，甚至所有歐美文學裡，都不存在這麼清楚的語言階層劃分。爲了要突出這些微妙的差異，譯者就不可能避免使用各種粗鄙的詞彙和語氣。

就這個觀點上來說，劉鶚的作品裡或許不一定有什麼新意，它只是完美地達成了它應盡的任務。不過，書中描寫景物的筆法卻有不容置疑的創新性。胡適特別強調了劉鶚在描寫自然景色時的創新與獨到之處。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自然是中國所有藝術最主要的靈感泉源，而中國的詩詞三千年來，幾乎已經用遍了各種自然界的景物象徵。劉鶚的寫景爲何生動有力，這一點胡適觀察得很仔細。中國詩歌幾百幾千年的發展下來，逐漸形成了一套意境的詞庫。詩人在歌詠自然之美時，自有相對應的詞彙可援引。大部分作者的靈感都不是來自親身體會，而是從前人典籍中挖掘可套用的陳腔濫調，用來點綴自己的作品。如果要做個比較的話，就好像現在歐洲拍電影的人都一定得拍些雲朵一樣。

然而劉鶚不同。他竭力避免平庸，不掉入前人俗套，一切恰如其分，就像我們在老殘與翠環的對話裡看到的那樣。老殘以凍河爲題作詩，詩一出搏得眾人好評。翠環言其從未讀過如此不同的詩作。老殘自信地回答，「『各師父備傳授，各把戲各變手。』我們師父傳我們的時候，不是這個傳法，所以不同。」<sup>53</sup>文中還把老殘的描寫筆法與詩作，拿來與其他作品的刻板描寫相比較。雖然只是簡短的比較，但也足以證明老殘的答覆自有其公道在。

劉鶚描寫音樂與歌唱，有著與眾不同的原創性。最好的例子就是第2回黑妞、白妞登場的片段。劉鶚不直接描述音樂本身，而是熟練

---

<sup>53</sup> 譯者按：見第十三回。

地通過視覺元素來比擬旋律的聲線，並且利用不同的選字來達到這個效果。在中國文學裡，很少有其它描寫片段可出其右。

從歐洲人的觀點來看，必須強調劉鶯在描寫鋪陳時並非漫無節制。這對中國讀者來說，本來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就像中國過去的繪畫，有時畫面上不過簡單勾勒便已足矣。中國的小說家也是如此。他們擅長用極少的字句突出重點，削減枝微末節，便足以成功在讀者心中召喚出他們希望營造的布局，就好像中國水墨畫裡的留白一樣。從這個觀點來說，中國藝術對歐洲藝術家同樣具有很高的啟發性（普實克按：其它關於作品形式的問題，例如章節的區分等，見《文字與修辭》所收拙文，此不贅述）。

此處需再補充筆者翻譯《老殘遊記》所採用的方法。事實上，筆者的翻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制於中文語言風格的簡練。讀者在閱讀時或許會感到詫異，為何小說譯文切割成許多很短的段落，部分句子讀起來似乎沒有前因後果，卻又顯得比其它句子更為重要，行文之間句子長度參差不齊。這些問題在中文原作裡都不存在。中文原作的段落相當長，句子大體來說也頗長，而作者也毫不打算在語句、段落結構上有所刪減簡省。每一個段落與句子都包含了許多信息。但中國文字個個不同，就好像是一連串有不同意義的獨立形象，看一眼就在讀者腦海裡激發許多具體想像。要瞭解這種情況的話，不妨想想當我們看到數字時，阿拉伯數字總是比用字母拼寫來得清晰明顯。正因為中國文字的這種特性，所以中國的作家可以將許多想法置入其描寫段落中，而不需要擔心許多信息會從讀者眼中溜過，沒被讀者注意到。

筆者的感想是，若是想要在翻譯中極大程度達到中國文字造型的豐富表現以及視覺美感，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把作者的每一個意念，或者每一組意念單獨抽離出來，讓每一組意念各自分別成段。筆者閱讀霍福民所翻譯的白妞片段（普實克按：見阿英，前揭書，頁22-23），更覺得有這個必要。因為霍氏的翻譯是一長段到底，以致於劉鶯原作裡那些豐富的表達手法，都在讀者眼前消融殆盡。

若要討論筆者將中文原作翻譯為捷克文的方法，或者說，將中文作品翻譯為外文的方法，就一定得先分析中文的語言特點與細節，否則就無法合理解釋為何筆者應該採用這樣的方法。譯者在翻譯中國的作品時（同樣情況也適用於翻譯拉丁文或希臘文的譯者），常會在兩種翻譯模式之間擺盪，也就是字面上的翻譯，以及較為彈性自由的翻譯。字面上的翻譯，常常必須與原文對照閱讀才讀得懂。而彈性自由的翻譯，基本上或多或少是根據主題隨興發揮。大部分翻譯成歐洲語言的中國小說，都是採用第二種翻譯方法。然而無庸置疑的是，所謂彈性自由的翻譯，往往一筆勾銷了原作形式上的趣味，而其實讀者對形式的興趣不見得小於對小說主題的興趣。這個問題相當重要，尤其是譯者在選擇翻譯作品時，常常身不由己，必須去配合歐洲讀者的口味偏好，而偏偏讀者喜歡的，不外乎就是那些具有中國情調的作品，跟歐洲作家寫的中國題材沒什麼兩樣。於是一些文學價值不甚高的小說，像是年代久遠的民間故事選輯《今古奇觀》、才子佳人小說《好球傳》等，都先後多次翻譯成歐洲語言。但是像《紅樓夢》這種小說，卻只翻譯了非常小的一部分（筆者指的是真正的翻譯，惟此處不欲發展此一論題）。另外還有一本小說《儒林外史》，堪稱中國名著之一，但迄今為止，漢學家們對其仍相當陌生。以上這些建議，期望能提供後人譯介工作之參考。

筆者嘗試讓譯文更為生動有趣，同時也期望能準確掌握原文文意。對筆者而言，準確掌握原文的意思，是鑽進作品裡每一個支微末節。除了筆者在註釋裡提到的唯一片段之外，其它部分一字未刪，悉數譯出。面對翻譯的各種難點，不管是占卜預言、詩詞或者是指涉不清的文學典故，譯者從未打退堂鼓。有些中國讀者熟悉的文學典故，歐洲讀者不一定明瞭，筆都毫不猶豫地在譯文中說明。在可能的情況下，筆者仍盡心藉由書後註解，將相關細節解釋清楚，期能讓有心的讀者進一步理解書中所言事項。

（普實克按：本文承蒙捷克國家科學委員會贊助，謹此致謝。）